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他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

“冷战”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①]，已经结束了。正是因为[illegible]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已经成为历史，人们才有可能在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回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于是，从[illegible]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②] 在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西方学界把冷战史称为冷战国际史。[③]

---

①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②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illegible]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illegible]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illegible]万之多。

③ 我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与那里的学者讨论了[illegible]这一概念的含义，故有此说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愿年代以前，东方[①] 各国，包括中国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②] 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③]

在冷战结束的 愿年代末 怨年代初，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 圆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④] 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 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

---

①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其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②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 俄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 员愿愿年出版第 员卷，至今已有 怨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③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 美国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 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

④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 保管、解密和利用》，载 俄史研究》，员愿愿缘。

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①] 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②]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illegible] 于 [illegible] 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

①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② 美国冷战史研究大家、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约翰·盖迪斯 [illegible] 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illegible]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①] 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illegible]），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②] 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研究。[③] 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④] 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互补和交流中提高各国学者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

---

① 这包括：[illegible]年[illegible]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illegible]年[illegible]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illegible]年[illegible]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illegible]年[illegible]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illegible]年[illegible]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② 该刊物已经进入国际互联网，网站：[illegible]网址：[illegible]

③ 据我所知，自[illegible]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④ 我和李丹慧仅[illegible]年[illegible]月至[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illegible]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成造成了人类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 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力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 21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世纪。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道路。[①] 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的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独到的贡献。

还有，目前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我们组织起来，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这些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出版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

---

①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illegible]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illegible]

献作为论著的基础，因为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① 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更要求使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就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②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

①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拟于今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分卷出版。这套[illegible]卷、[illegible]万字的大型文献集预计[illegible]年出齐。

②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中文版，[illegible]页，商务印书馆，[illegible]

谨以此书献给

引导我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学术前辈

朱庭光先生和齐世荣先生

目　　录

前言：依然做书生 …… 员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 …… 员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 圆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 …… 缘
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猿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 …… 员源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员愿
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 …… 员圆
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 圆园
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圆缘
员怨缘缘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
…… 圆愿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员怨源缘—员怨缘怨年）…… 猿园
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 猿缘

附录：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文献 …… 1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 …… 1
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 …… 1

后记 …… 1

前　言：

依然做书生

这里收入的是我最近五年来撰写的关于 [illegible] 年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研究的部分论文，以及经过我本人收集、挑选、整理和注释的有关上述专题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当我完成这项编辑工作时，回想这些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抚案沉思，慨叹不已。

几个月前，我去看望年逾八旬、身罹病痛的学术前辈周一良先生。他送给我一本他的近作《毕竟是书生》，并且颤颤巍巍地用左手在扉页上签了名。此前，我曾从《作家文摘》上看过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它真实朴素地讲述了老先生自己曲折的一生，无扬美，也不抑丑，无多少高谈阔论，也没讲什么大道理，依然是书生本色，阅后令人感慨。此次再读，并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更别有一番感慨。

我进入学术界，已有 [illegible] 余年了。看到当年的同窗学友甚至更年轻的学子，凡学有所成者，都已桃李满天下，或扬名国内外了，而自己却才开始梳理近作，不免生出些许惭愧。

细细想来，自 [illegible]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illegible] 年考取硕士研究生至今，我辍学的时间竟多于真正学习和做学问的时间。但是平心而论，这绝非出于个人意愿，而完全是命运使然。换言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不是我本人懈怠，而是历史境遇不允许我去努力。

我这一生经历了两次辍学和续学。[illegible]年因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被迫中断了中学学业。此后当过海军，做过钳工，还当了几年干部。知识需要积累，不能上学就自学。也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放弃了多少节假日，甚至[illegible]年春因政治事件身陷囹圄时，还在读《资本论》。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将近而立之年，我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然而，就在[illegible]年夏天我即将毕业，获取研究生学位时，又是由于某种意外的政治原因使我再次被迫离开了学界。此后的一段经历便更加坎坷，也更为复杂了。坐牢，种地，办报纸，开工厂，办农场，做生意，玩股票，整整十年，游荡于农村、工厂和商界。不过在此期间，我始终没有忘记导师齐世荣先生[illegible]年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你刻苦努力，认真做学问，十年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这些年来，我时常梦想着重返象牙塔，可惜时至[illegible]年代末，我竟然还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而无法进入。

或许是对治学生涯的热恋，抑或是对遭遇不公的负气；或许为了追求一种被人认为是高尚的理想，抑或为了找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之，经过一番努力，十年之后我又回来了。[illegible]年代初，我回到北京，重归史学，再拾旧业。在人生旅程中辗转[illegible]多年，思来想去，还是要做个书生。

我原本是研究苏联史的，以前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都是关于[illegible]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这次重返学界，我给自己确定的研究领域是战后苏联对外关系史，首先是战后斯大林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八年里，他所处理的远东问题中最大的事件就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争问题。我即是从此入手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涯的。

应该说，中苏同盟的起源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都是史学家

长期研究的课题，国内外有关的学术论著已汗牛充栋，以我的功力和基础，要在几年之内跻身大家行列，自然是有困难的。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也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我从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角度，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往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大多是从中美关系切入的，而我于研究中发现，在 [illegible] 年代初期，牵动远东局势变化的主要是斯大林对冷战外交的思考及其实施的政策。第二，我所利用的基本史料都是俄国近年来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即我国史学工作者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说这几年我的研究还算是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和使用原始档案材料是基本功。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外国史研究，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很难看到第一手资料，往往要吃国外学者嚼过的冷馍。这种状况常令研究者在攀缘学术高峰时，举步维艰。好在命运之神并不总是对我冷眼相待，当我再次开始治学后不久，便幸运地赶上了国际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发生的一次令世人振奋的变化，即俄国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

[illegible] 年代末，一向封闭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开始解密。至 [illegible] 年代初，俄国一些重要档案馆已经可以对各国学者开放，不少俄国报刊杂志也在不断公布和发表有关的档案文献。这一情况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大量收集苏联历史档案。美国、德国、英国、挪威等西方国家的图书馆中都开始收藏并陈列大量俄国档案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关于某些历史专题的档案集也陆续以俄文和英文的形式出版。毫无疑问，这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苏联历史、现代国际关系史，乃至 [illegible] 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广泛利用目前俄国的解密档案，不仅可以解除我们以往缺乏第

一手研究资料的苦恼，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中与国外学者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于是，在紧张地从事专题研究的同时，[illegible]年底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建议：立即开展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苏联历史档案文献的工作，并表示愿意自筹资金完成这一项目。经过充分协商、论证和多方的努力，[illegible]年 远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将苏联历史档案的收集、翻译和整理列为院九五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联合成立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illegible]年 圆月，经中宣部批准，国家新闻出版署又决定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三年多来，课题组全体成员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来源收集到 员万多份俄国档案文献的复印件，其内容包括了从 [illegible]年十月革命起至 愿[illegible]年代中期止苏联历史上所发生的各项重大事件。目前，翻译、整理和编辑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着，一部多卷本、约 [illegible]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也已在计划出版之中。

此间，我除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外，还具体整理和编注了 [illegible]～[illegible]年的档案文献。本文集选入了其中有关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以及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解密档案文件。收入本文集的“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一文，是我为即将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所写的序言。至于“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一文，则是根据有关俄国资料及我个人的考察编写的，在此刊出，亦或能对读者有益。

虽然，还远不能说我收集的档案文献已经满足了研究之需，更不能说我的研究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收集的档案文献。但是，我确实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目前，事情的进展情况尚能令人欣慰。当然，也更使我亢奋。因为，对俄国解密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似乎已成为我的一项使命。只是，这个自寻的使命也是一种重负，短

短几年时间，它染白了我两鬓的乌发，加深了我眼角的皱纹。不过，我并无悔意，且将继续潜心于此，以此自慰，并报答我学术生涯中的师长学友，以及在我收集档案中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两位恩师是我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老领导朱庭光先生和我的研究生导师齐世荣先生，他们对我恩重如山，是他们把我领入了历史学的殿堂，并指导我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学者。北京大学的徐天新先生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叶书宗先生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中指点我，帮助我，而且在我遭受挫折时给予了暖人心怀的理解、鼓励和支持。此外，还有一批与我同行的志同道合者，我今天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合作与协助。

收集和整理国外史料，自然需要国际学界的帮助。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私人访问，这几年我也结识了不少外国朋友，他们在学术信息方面对同行的慷慨大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亚非研究室主任哈桑诺夫（Казанов）先生、俄国历史研究所的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和梅利霍夫（Мелихов）先生是我们在莫斯科工作时经常在一起的朋友，这几位俄国学者为人诚恳，待人热情，不仅请我喝伏特加，更多地是为我四处奔走，查找所需要的档案文献。尽管由于技术问题联络不便，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我所托付的事情。

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先生原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到外交部，出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现已回国任远东司第一副司长）。我们是通过学术界的朋友认识的，虽然交往不深，但他对我致力于苏联历史研究的志向深表支持，不仅将自己做研究时的有关资料提供给我，而且在百忙之中几次抽出时间，连续数小时与我谈话，解答我的疑难，甚至将很多档案原件中难以辨认的手写批语和签名一一给予指点。

我与联邦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海因茨希 [illegible] 博

士只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当我得知他掌握了一批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并通过电子信箱向他索取时，他即慷慨地按照我提供的目录一一复印邮寄给我，这种豁达大方的行业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学习。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保存了大量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文献。我先后两次在那里工作时，原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主任王大卫 [illegible]先生，以及当时负责档案整理工作、现任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主任的奥斯特曼 [illegible]先生都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对我连续复印上万页文件的工作给予了大力帮助。

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韦斯塔 [illegible]先生不仅曾向我提供了他所收集的一些档案材料，而且以他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数年的经验，为我在俄国开展工作搭桥引线，指点迷津。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 [illegible]女士，她所提供的帮助至今令我感动不已。作为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国档案馆查找文件，个人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当我在美国向她谈起我收集俄国档案的困难时，她深表同情，并热情地带我到她的书房参观，详细向我介绍她所收藏的档案文献。她不仅无偿地向我提供了大批文件，而且还利用假日亲自复印这些材料。

旅美华人学者、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历史系陈兼教授不仅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学友，而且十几年后成为我在异国的学界同行。他为我在美国收集俄国档案的工作倾心尽力地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他细心周到地为我安排在美国的全部行程，帮我与美国各有关档案馆和图书馆取得联系，陪我走访与俄国档案有关的专家学者，甚至在我回国以后，还替我完成了许多与我的课题有关而应在美国进行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兼的帮助，我在第一次访美的一个月时间里，就能得到 [illegible]多页俄国档案复印件，是根本无

法想像的。

这里还应提到我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柴文刚，他在伦敦一家英国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与我本不是同行。但是，当我向他倾吐衷肠，并让他了解到我们这一课题的意义后，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帮我在英国联系和收集档案的业务。他不仅帮我打探消息，联系业务，替我起草有关的英文文件，还不远万里奔波于美国和加拿大，代我与有关方面进行谈判。尽管这方面的努力最后未果，但他帮助老同学的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我将永远铭记心中。

最后，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北京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总经理于洋先生。于洋先生同我一样出身于“老三界”，“文化大革命”后考入工科大学。作为业余兴趣，他酷爱读史，并且关心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我所设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就是由他运作的。在我们几年的交往中，他无论在经营中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如既往地在资金上给予我的研究中心和资助项目以特别的优惠和关照。他一再鼓励和支持我专心搞学术研究，不要为一时的经济困难分心。在如今的商业化大潮中，尚有如此志士仁人，如此志同道合者，怎能不令人感动？!

尽管历经坎坷，命途多舛，到今天我毕竟是圆了一个史学梦。我知道，在以后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不论个人际遇如何，我都会和自己所热衷的事业相始终，共沉浮。“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解我的人，或者多少知道我的经历的人，大概可以从这由衷的感叹中觉察到一缕心酸，一丝苦楚。不过，我并不抱怨什么。人总是要付出的，而且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你的付出应大于你的所得。所谓“斯文一脉”，我想，我这辈子能够像周先生等学术前辈一样，保持读书人的风格，做一个书生，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书生，也就心满意足，死而后已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